

# 乌兰夫率兵打响“草原抗日第一枪”

2

历史纪实



宋国涛著  
人民日报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随着中国共产党各省委员会的建立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代省委书记。他们在战火硝烟中经受锤炼；他们领导人民群众接管城市、建设民主政权、开展土地革命；他们带领群众恢复生产、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，战胜艰难险阻，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。

本书介绍了彭真、黄敬、林铁、程子华、乌兰夫等29位开国第一任省(市、自治区)委书记的事迹，展现开国建国的巨大艰辛，启示人们更加珍视今天和平安定的生活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1949年，林铁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河北党委书记。

##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 乌兰夫

1947年5月1日，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在乌兰浩特举行，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，乌兰夫当选为政府主席。5月31日，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成立，乌兰夫任书记(后任自治区党委书记)。乌兰夫成为开国第一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。

“乌兰夫”蒙文原意是“红色之子”。乌兰夫幼名庆春，原名云泽，蒙古名乌云达赖，1941年改蒙古名为乌兰夫。

乌兰夫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一个蒙古族家庭，生于忧患，长于忧患。轰轰烈烈的“五四”运动爆发后，他考入归绥(今呼和浩特)土默特旗高等小学，受到新思想新文化的影响，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身到反帝爱国运动之中，成为“早期觉醒的蒙古族青年”的杰出代表。

1925年11月，乌兰夫离开家乡前往苏联求学，一路同行的还有张闻天、王稼祥、杨尚昆、伍修权等。在开往苏联的轮船上，乌兰夫曾写了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“胸怀救国志，肩负民族托”，表达了乌兰夫远大的理想和抱负。

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，乌兰夫在第1期第6班学习，由于他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，被允许提前毕业，到莫斯科步兵学校参加军训，然后被调到东方大学政治班做教学翻译。

1928年6月，在国内白色恐怖的情况下，乌兰夫坚决要求回国工作。

1929年6月，经组织批准，乌兰

夫从苏联绕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回到内蒙。回到家乡后，乌兰夫以故居为中心，在周围村庄建立起十几个农民协会，开展抗租抗税斗争，在蒙古族青年中秘密发展党员，为党培养民族干部。不久，乌兰夫接任了中共西蒙工委书记职务。

乌兰夫的革命生涯，给自己家庭带来的几乎是灭顶之灾。家中的房屋先是被日本侵略者、后被国民党军3次焚毁。据目击者说，日本人焚屋的大火几天几夜未曾熄灭，家里的所有家具、书籍均被付之一炬。乌兰夫的父母只得背井离乡，乞讨为生，在颠沛流离中先后故去。乌兰夫的胞弟云浦，曾任大青山抗日游击队蒙古支队队长，作战勇敢，牺牲时年仅35岁。

日本帝国主义发动“九·一八”事变进而建立伪满洲国之后，加紧了内蒙古地区亲日派的策动和扶植，对内蒙古地区采取公开军事占领与隐蔽的政治阴谋同时并行的政策，为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做准备。在这样的历史紧要关头，乌兰夫领导发动了百灵庙武装暴动，举起了内蒙古人民抗日救亡的义旗，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推行“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”的罪恶企图。

由此，百灵庙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草原小镇，一夜之间名闻遐迩，鼓舞了全国人民御侮救亡的斗志。正如毛泽东所评价的，这是“可贵的草原抗日第一枪”。

1937年10月，日军进犯归绥，当地驻军不战而退，唯有乌兰夫率领的蒙旗独立旅从固阳星驰至归绥南郊，与日军血战一昼夜，给予敌人重创。

日本投降后，内蒙古地区成立了所谓“内蒙古共和国”，领导人全

部是伪满和封建上层。中央委派乌兰夫去解决这个具有危险性而且相当复杂的重大问题，乌兰夫不负重望，立下头功。

1945年10月，乌兰夫受中央派遣去苏尼特右旗，解散了“内蒙古共和国临时政府”，组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，并亲任主席兼军事部长。1946年初，乌兰夫率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表团赴承德，与东蒙自治政府代表团谈判，经过耐心诚恳的说服和艰苦细致的工作，使得蒙古族各阶层人士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民族联合起来、共同建立统一国家的方针。1947年5月1日，乌兰夫在乌兰浩特主持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大会，宣布成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，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自治政权诞生。

此时，解放战争正在进行中，内蒙古自治政府比新中国成立早了两年。后来，周恩来曾经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谈到了这件事，称赞乌兰夫“一个人解决了一个共和国，是真正的单刀赴会”。

1959年至1961年，是新中国历史上的3年困难时期，全国食品严重匮乏，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南方许多地方的福利院里，多名孤儿因为粮食不足导致营养不良，甚至濒临死亡。孤儿院纷纷向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告急。康克清也很着急，她与乌兰夫商量，能不能从内蒙古调集一些奶粉救急。

乌兰夫收到康克清的告急信后，连声说道“可以，可以”。但乌兰夫想，仅仅供应一些奶粉，只能解决燃眉之急，时间长了怎么办呢？

他与内蒙古自治区其他领导商议，提出“由内蒙古人民养活这些孤儿”，大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好办

法。乌兰夫把这个想法向康克清进行了汇报，同时迅速报告了中央，立即得到周恩来总理的赞许。周总理在电话里激动地对乌兰夫说：“哎呀，谢谢你们啦！”

周总理当即拍板，从内蒙古调集专列专护，迎接这些孤儿去内蒙古。一列列火车从遥远的南方来到绿色的草原，天真的孩子们睁大了好奇的眼睛。乌兰夫亲自到育婴院检查接送孤儿的情况，看望孩子，嘱咐医院的保育人员要照顾好孩子，治好他们的病，乌兰夫还提出了“收一个，活一个，壮一个”的要求。

自1960年到1963年，在两三年的时间内，内蒙古各地先后接纳了3000名来自江苏、浙江、安徽等地的孤儿。这些孤儿小的只有几个月，大的也只有7岁，大多数面黄肌瘦，有些还在患病。乌兰夫安排工作人员把年龄大一点、身体好一些的孤儿直接送到牧区，年幼患病的孤儿则在呼和浩特、锡林浩特和包头等地设立的育婴院进行治疗，待这些病儿恢复健康以后，也陆续送到牧区去。

正像乌兰夫讲的那样，牧民们非常喜爱这些孩子，有的家庭还收养了两三个，甚至五六个孩子。有的甚至从几百里外赶来领养，他们把孤儿接回自家的蒙古包，用最好的牛奶或羊奶喂养他们，教他们说蒙语、唱歌、跳舞、骑马、打猎，供他们上学读书。以普通母亲的爱心，给了孤儿无私的母爱。

这些孤儿在蒙古族牧民的哺育下，从小学习蒙语，接触蒙古族文化，既是汉族的后代，也是蒙古族的儿女，长大成人后很多人留在了牧区，成为和他们的养父母一样的蒙古族牧民，他们把根深深地扎在了草原上。

# 日本占领香港后，妈妈带我们回内地

5

传奇人生



许燕吉著  
湖南人民出版社友情提供

## 【内容简介】

“我是许地山的幼女，可惜在他身边的时间太短，但他那质朴的‘落花生精神’已遗传到我的血液中：不羨果枝头，甘为土中一颗小花生，尽力成为‘有用的人’，也很充实自信。”

自传虽然讲的是个人经历，但却能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一段历史。落花生的女儿许燕吉生活在一段动荡的岁月，从国家干部摇身一变成铁窗女囚，名家才女嫁给了白丁老农，其间的艰辛曲折、酸甜苦辣，称得上传奇故事。

## 【上期回顾】

爸爸去世后，妈妈只好出去工作养家。但安定的日子没过多久，香港就沦陷了。

香港史称“黑色圣诞”的1941年12月25日晚，港英政府挂白旗投降日军了。第二天早上人们才知道。

日本人由两个汉奸带着，他拿着枪，站在门边。两个汉奸掏出个布告样的纸片给妈妈看，说是要“借”被子给“皇军”，就径直向卧室去拿。袁妈扑到被子上按住，说：“这个正盖着的，不能拿。”他们又去拽另一床被，袁妈又扑上去按住。妈妈怕汉奸要打袁妈，赶快去把贝特兰盖的那床被拿来给他们。他们还要，又给了一床挺厚的俄国毛毯。他们还不走，又给了一床薄些的被子，才算不出声了。

走到楼梯口，妈妈追上去要汉奸写个“借条”，汉奸倒是写了。他们走后，妈妈把“借条”贴在大门外。也许是起了作用，抢被子的没再来，可抢房子的来了。

来的是个穿便服的日本人，带个翻译，把几个房间看看，就说让我们马上搬走，他明天就要房子。

妈妈面对这种霸道的占领者，知道和他们是没道理可讲的，更不要去求他们，所以一句话也没讲。他们走后，妈妈定定神，马上去30米外的郑家，请求租他家的客厅过渡。

郑先生爽快地答应了。郑先生是香港中国银行的经理，那一幢四层楼连半地下的底层都是他家的。客厅在一层，挺大，占了一层的一半面积，还带一个向着马路的大阳台。我们一秒钟也不敢耽搁，收拾的收拾，运输的运输。袁妈、刘妈还有我和哥哥就成了搬东西的主力，像蚂蚁一样，穿梭来往，东西一放，马上回来，真叫马不停蹄。

下午，那个日本人又来了，一看，按住这件说“这不要搬”，又按住

那件说“这也不要搬”。他一转身，我们马上就搬走这件。记得客厅里有一张红木镶边的大理石桌，我和哥哥抬起就走，重也顾不得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跑这么多路，出这么大劲。晚上，大家累得连铺盖都不打开，在堆得满满当当的郑家客厅里，靠在行李卷上，腿疼得没地方放。天亮又接着干，等上午日本人来，基本上就剩下一个空房子了。他愤愤地说了句“我不要了”，扭头而去。这场斗争我们虽获全胜，但往回搬可就搬不动了，搬了一个月，还交了两边的房租。朋友们说打仗以后，房租都停交的。妈妈说，人家肯给我们救急，就感激不尽了，怎么能再这样！

香港大学的师生在战时组织了护校、救治伤员等工作，停战后也没解散，考虑到经过18天的战乱，各家都将断炊，便住在近处的家属们也到他们的食堂吃饭。我家也享受了这份照顾。妈妈、婆婆、熊婆婆和我们兄妹共五人便一天三回往港大跑。在港大吃了一个多月，日本人开了粮站，按户口本配售平价米，港大的特殊照顾也就停止了。

后来，妈妈被介绍到贻育医院做事务员。贻育是一家妇产医院，在西边街上，离家也近，当时有这么一份工作真是不容易。

夏天，华仁书院复了课，是所男校，只能哥哥去上学。我的学校成了医院。战后，校长也入了集中营，我就在家“博览群书”。“群书”是商务印书馆出的一套“小学生文库”，马鉴伯伯家回内地时给的，有100多本，公民、历史、地理、化学、生物都有。而我专看童话、民间故事和小说，多半能看懂，比如《黑奴魂》、《天方夜谭》等。午饭后，我下山给妈妈

送饭去，就留在医院做妈妈给我指定的算术题，等妈妈下班一块儿回家。

我每天做算术题的空房间大概是医院的教室，中间一张长条桌，一排窗户临着西边街，窗下放了一张没有挡头的铁桌，罩着洁白的床单。我不敢把床单弄皱，更不愿意看窗外的悲惨人群，习题做烦了，就只有拿墙角那副人骨标本解闷了。那是一副完整的人骨，吊在支架上，各个关节有铜丝连接，不但能动，还很灵活。我拉住它的手一拽，它就稀里哗啦地摇摆一通。那时我人矮，视角低，没有和那龇牙空眼的骷髅头面对面，否则是不会那么开心的。做一会儿题，和骷髅跳会儿摇摆舞，时间也就过去了。

战争进行中间，朋友们相互都是生死不明，家里只来过一位客人，就是给爸爸做坟的石匠。他看我家在半山，面对敌人的炮火，目标显著，让我们到山下他家去躲避。才相识不久的人，冒着危险上来关心我们孤儿寡母，妈妈十分感动。

停战后不久，就听说我们原来的房客弗朗士牺牲了，陈寅恪伯伯一家，还有梁漱溟先生都逃回内地了。楼下住的梭特先生入了集中营。他的厨子把家里的罐头给他送去了，说是梭特变得又老又瘦，在集中营要干苦力活儿，还挨日本人的鞭子。见到这位中国仆人竟痛哭失声。房客贝特兰入了俘营，日本投降后，他写了一本书——《在战争的阴影下》，在美国和英国出版。四十多年后，他将原稿寄给了我哥哥周岑仲，由我哥哥译成中文，编入中国和平出版社的“国际友人丛书”，也算是一种缘分。

熊婆婆在交通恢复之初就回上海了。走之前，她希望和我妈妈一起去看望一下蔡元培夫人。我妈妈说，小报记者知道后，会对三个寡妇凑到一起做些无聊的文章，所以就让我陪她去了。蔡夫人我以前见过，蔡先生两年前在香港去世时，我父亲主持了他的丧葬大事。经历了战乱，蔡夫人更显得瘦弱憔悴了。

最后，我还陪她过海，去万国公墓给熊公公上坟。墓地虽中过炸弹，但熊公公的坟无恙。再问蔡元培先生的墓，看坟人说没有这坟，我们以为炸坏了。正遗憾时，看坟人恍然大悟似的说：“你们要找蔡子民吧？”熊婆婆哭笑不得，只好点头。原来碑上刻的是“蔡子民先生之墓”，看坟人认为是“子”字。蔡元培先生的墓碑被弹片崩掉一角，幸无大损。

香港人不堪日本的统治，日本人也维持不了这一百六十万人的香港，回内地的人很多。人走得多了，一方面日本人减轻了负担，另一方面可以大量搜刮民财。凡是上船的，担子、行李都要打开让他们搜，好东西，他们就要了；看不顺眼的，或有怀疑的，就顺手扔进大海。我们在香港没有家业，单靠妈妈的工资难以维持一家六口的温饱，也不愿过这种亡国奴的日子，将来还会发生什么情况也未可测，所以妈妈决定我们也走，回内地。

走之前妈妈带我们去和爸爸告别，坟依然是土堆，妈妈在一边坐了许久，以致我们玩得都打起架来。妈妈流着泪喝住我们，指着土堆说：“这是你们爸爸的坟哪。”我们才又悲从中来，乖乖地挨着妈妈，低着头坐了许久，惭愧不已。

别了，香港。别了，我的童年！